

国外中国研究

第一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编

一九七七年四月

国外中国研究

第一辑

目 录

美国研究中国的主要机构和人物概述	(1)
美国学术界强调研究中国	(34)
美国中国学中的“新左派”	(46)
费正清	(50)
七十年代的任务	(70)
书 讯 美国出版中国人名辞典	(87)
编 后	(88)

美国研究中国的主要机构 和人物概述

- 一、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中国的研究
- 二、美国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对中国的研究
- 三、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动向

一、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中国的研究

美国资本主义进行海外掠夺性贸易，特别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扩展的需要，是美国的中国学最初兴起的主要动力。

十八世纪末，美国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后，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加速了美国商业资本对海外，特别是对中国的扩展和掠夺。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商业资本大量侵入中国，成批商船来到了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过其开发本国边疆的兴趣。“有整整一代的时间，对纽约人和波士顿人来说，到广州和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为容易，更加赚钱。十九世纪头五十年，中国边疆常常更加吸引人去做生意，就和英国人在十八世纪遇到的情况一样。”^①

^①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美国历史评论》1964年第8期。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作为美国“文化”侵略先锋的传教士，也于1830年乘着美国首批商船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到1875年，其人数已超过二百人，1898年已达一千五百人。美国最初的汉学家，就是从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华分子中培养出来。如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卫斐烈等都是。

裨治文（E.C.Brindgman 1801—1861），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后来当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官。他于1830年到广州，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自任总主笔。该杂志以报道中国的历史、风俗和重大时事、传教士的活动为其宗旨。这是美国最老的中国学杂志。美国学者布利顿（R.S.Britton）认为，该杂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以及它同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的历史，直到现在仍保存其史料上的价值。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 1812—1884），同样最初也是传教士，后来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当秘书，度过多年外交生涯后，晚年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的称号。他是1833年来中国，开始时任广州公理会印刷所经理，协助裨治文编《澳门月报》，后来继裨治文任《澳门月报》主编。1848年发表了他的两卷本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48）。此书在美国学术界被看作为标志美国中国学开端的里程碑，在美国和英国多次出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国外流行。

此外，**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 1827—1916）、**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3）、**卫斐烈**（Frederick Williams 1857—1928）也都是那时来中国的有名的美国传教士，他们也编写过有关中国语文和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著作。

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披着宗教外衣的侵华分子。当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竟发表谬论说：“鸦片战争乃出于上帝的神示，开创了美国和中国关系史上的新时代”。鸦片战争结束后，裨治文等又为美国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出谋划策，胁迫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使美国攫得了侵害中国主权的领事裁判权，得到了“最惠国待遇”，享受了中国给予其他国家的一切权利。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向美政府献计，采用保存满清皇帝，实行以华制华的办法，使列强与满清政府订立了辛丑和约。美国除分得赔款3290余万两外，并和其他列强同样攫取由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兵权。所列事实就是裨治文等美国早期传教士侵华罪行的铁证。

也正是裨治文、卫三畏等美国早期传教士，加上美政府在远东的外交官员顾盛、伯驾等人组织了美国第一个研究东方国家的机构——美国东方学会。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于1842年经马萨诸塞州法院批准成立，会员最初就是裨治文、顾盛等远、近东的传教士和政府外交官员。其宗旨自称是“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

究”。它从1851年开始出版《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后又出版《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并设有一个收藏东方文献的图书馆。它每年春季召开连续三天的年会，交流情况，促进东方学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的方式之一，最初就是通过东方学会来进行的。因此，美国东方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开端。

美国大学中陆续设立中国学教研机构是美国的美国学形成的标志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也象英、法、德等国一样，开始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过渡，美国垄断资本的出现和发展，要求系统地培养远东及中国问题的学者，来满足其向远东特别是向中国扩展侵略的需要。因而，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学中开始相继设立东方学或中国学的教研机构。最早是耶鲁大学，它在卫三畏主持下于1876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同年还有加利福尼亚大学。1877年有哈佛大学先后开设汉语课程和东方学图书馆。十九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中文教研室。与此同时，美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如著名的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等也开始大量收藏中国图书文物。

美国的中国学在十九世纪这个草创阶段，尽管有较快的发展，建立了东方学会，出版了刊登有关中国资料的定期刊物和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大学里设立了东方学或中国学的教研机构，中文列入了大学教学提纲，成立了东方学或中国学图书馆。但还是远远落在英、法、德、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沙俄之后。所以它发展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广泛地吸收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来从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中国学为适应美帝国主义扩展政策的需要，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的专家队伍。

二、美国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对中国的研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走上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开始参与列强瓜分世界和远东的争夺。1898年它发动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果在远东攫得菲律宾，成为它侵略中国及亚洲大陆的跳板。接着1899年它就炮制了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瓜分中国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趁欧洲列强忙于大战无暇东顾之际，大力扩展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从二十年代起，美国垄断资本为其向外扩展的需要，先后建立了为其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的所谓“慈善”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1911年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建立）和福特基金会（1936年建立）等，并开始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进入三十年代后，当美帝直接准备与其掠夺中国的手——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瓜分中国时，垄断资本基金会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提供资金大为加强，并给予美国大学中的东方学教学和研究以多方面的资助。结果二、三十年代期间，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显著增加。截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共九十多个，其中有三十九个就是在1920—40年这短短二十年间建立的。其间在亚洲研究

中的主要机构有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美国学者团体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等。

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或称**美国太平洋学会** (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建于1925年，是一个有关东方问题的私立研究机构，这里聚集了一批美国研究东方各国现实问题的学者和受过东方高等教育的人士，还有政府官员等。该学会成立后，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国学的研究工作和扩大东方学家——远东问题专家的训练工作，还从事大量亚洲图书出版工作，1941年以后，它对美国促进亚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五十年代以前，美国出版的关于亚洲的书籍，约有一半是在这里出版或者得到了它的资助。除出版书籍和刊行小册子外，还出版了《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月刊以及《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和《远东文摘》(Far East Digest)等杂志。

美国学者团体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是一个有关人文科学团体的联合机构。它成立于1919年，设有研究津贴和助学金。该会成立的宗旨主要是负责组织会议和出版等活动，来促进美国人文科学的研究活动，亚洲研究方面的任务是和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合作，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基金，对于亚洲及现代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该学会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二十年代末，它适应美帝加紧侵略中国的急需，先后于1928年12月和1929年4月两次在纽约召开中国研究促进会议，会议讨论和制定了为编制文献目录索引、

派遣留学生奖学金制度和出版中国文化丛书等任务和措施，并通过决议在其领导下设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常设委员会，来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活动的领导，以保证其计划的实行。学会出版机关刊物《美国学者团体协会通讯》（The ACLS Newsletter）。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成立于1928年，是美国研究亚洲首先是研究中国和培养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学者的研究机构。1919年美国匹茨堡一个工业家、工程师查理士·霍尔（Charles M. Hall）死后，遗嘱捐出他的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促进中国、日本等国教育事业的经费”。后来他的遗嘱执行人适应美国垄断资本加紧侵略中国的需要，把研究中国问题作为主要课题来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扩展侵略政策服务，并制定了一项计划，规定在美国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以便促进美国的东方学教育事业和远东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规定这个研究机构的活动一定要与中国有关大学的活动相协调，结果在美国确定了哈佛大学，而在中国则选定了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于1928年1月宣布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该社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亚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出版工作。它设有自己的基金和独立的研究和出版机构，并出版有自己的刊物。1936年，哈佛燕京学社并入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但仍保留其原有的职能和它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学的主要中心，成为促进远东各国语言、历史、文化、国家制度、经济、文学等问题的研究措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出版有《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

tic Studies)。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 (China S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建于1800年,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图书馆。美国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以后,国会图书馆也急速发展成为收藏、编辑整理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历史文化的重要单位之一。1927年它成立了中国部,那时负责主持这个部的是美国学者恒慕义 (Arthur W. Hummel)。1929年该馆从天津盗买了22,000多册中文图书文献 (其中有87册是九至十五世纪的木板雕刻, 276册是明代的出版物), 加上1879年收购的由美国外交官顾盛从广州盗买的2,500本汉、满文图书文献以及美国外交官柔克义 (W.W. Rockhill) 赠给的6,000本中文图书, 再加上三十年代间洛克非勒基金会赠款购买的中文图书文献, 到三十年代中期, 该馆中文藏书达135,000册, 成为美国收藏中文图书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出版有中文文献目录和研究指南。

美国垄断统治阶级通过这些组织, 控制和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已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培养出了一批为其侵略中国服务的专家队伍, 如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立雅、卜德、戴德华等都是。

恒慕义 (Arthur William 1884—1975年), 起初是美国公理会教士, 1915年来华, 最初在山西铭贤中学当英文教员, 后来任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1927年返国后任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三十年代在美国学者团体协会发起组织下主编出版了《清代名人传略》 (the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Dynasty, 华盛顿, 政府出版局, 二卷1943—44年), 专门研究中国史, 出版有好多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和论文, 是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界现代实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为战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重要成员之一。曾任该会1948—49年度主席。

赖德烈 (K.S. Latourett 1884—), 美国基督教会史学家。曾两度(1910年, 1920年)来华。返国后任耶鲁大学教授。二次大战后是美亚洲研究协会重要成员, 曾任该会主席(1954—55年)。著作有《过去七年来的中国史研究》(1921)、《中国基督教会史》(1929)、《中国历史和文化》(1934, 1964)、《中国的发展》(1946)、《近代中国史》(1954)、《中国》(1964)等书。赖德烈的著作都是宣扬神学观点, 他以基督教教父的观点来伪造中国历史, 如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展, 说成是基督事业的扩展。他是当代美国史学界教会史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韦慕庭 (C.M. Wilbur 1908—),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 美国历史协会、东方学会、亚洲研究协会主要成员(1958—61年任理事, 1971—72年任主席)。1932年来华在北京美国教士办的学校进修二年。回国后194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二次大战期间任职于美国战略局(1943—46), 战后1946—47年供职于美国国务院。1947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 1957—64年任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最初研究中国古代史, 著有《中国前汉时期的奴隶制》(1943), 后转到中国现代史, 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编有《有关中国共产党运动史等的日文资

料》(1954)、《有关中国共产党运动史等的中文资料》(1954)、《关于1918—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件, 1927年在北京搜查没收的文献》(1954), 并翻译和介绍中共史料, 如八一起义前后党中央刊物《中央通讯》等。

顾立雅 (H.G. Creel 1905—), 芝加哥大学中国语言和历史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亚洲研究协会主要成员。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中国哲学硕士, 1927年获文学硕士, 1929年获中国哲学博士。两度(1932—35, 1939—40)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名义来中国留学。返国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36—37讲师, 1937—41助理教授, 1941—49副教授)。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至1962年)。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政府制度史。著有《中国的诞生》、《孔子——一个人和神化的人》、《中国的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1959)、《孔子与中国的方向》(1960)、《中国治国技能, 第一卷: 西周帝国》(1970)等书。

卜德 (Derke Bodde 1909—),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教授。美东方学会成员(曾任1968—69年度主席)、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曾任1968—71年理事)哲学学会成员。1930年哈佛大学毕业, 1931—35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来华留学。返国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汉语系讲师、副教授, 1938年起任教授。二次大战期间在美战略局和战时情报局供职。战后又以富布赖特研究员身份再度来华。1950年返国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教授。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著有《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1938)、《古代

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1940）、《中国对西方的贡献》（1942）、《中国思想在西方》（1948）、《中国的文化传统》（1957）。翻译有《中国哲学史》（两卷，1952—53）。

戴德华（G.E.Taylor 1905—），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教授（1969年起）。美国学者团体协会、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重要成员。1928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1928年返美就学于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1930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来燕京大学留学。1933—39年期间相继任教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和燕京大学。二次大战期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和战时情报局。战后，1946年起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国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到1969年）。1969年起任华盛顿大学教授。研究亚洲历史和政治。著有《为华北而斗争》（1941）、《转变中的中国》（1942）、《现代世界中的远东》（1956，与人合著）、《菲律宾与美国》（1964）和论文《共产党中国是我们的迫切问题》（《亚洲概览》，1961年2月）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垄断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为适应其扩大侵略中国的需要，从资金和组织上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大战期间，美国从事东方学教研工作的第一流大学有十三所，其中有六所是在战争年代才开设东方学课程的。此外，还采取种种紧急措施，加速培养远东专业人员，如在全国许多大专院校举办有关的短训班，所谓“军区民事部国外地区和语言课程计划”（CATS）和“特种军事训练计划”（ASTP）及陆军外国语学校、海军语言学校等。中国学研究的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比重大为提高。美国在1942—1945年5月出版的五十部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中，有二十部是研究现实问题的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加强研究中国的趋势有增无己。这表现在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不断增加资助和拨款，使中国学教研机构不断增加。仅以大学统计，到五十年代时，已有三十多所大学设立了亚洲或中国研究中心。兹将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几个重要大学的主要研究中国的机构和主要代表人物概述如下。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是美国研究中国的较早中心之一。它设有两个东亚研究中心，一个就是1928年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二次大战以来，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 (J.K. Fairbank)、许华茨 (B.I. Schwartz)、舒尔曼 (F.H. Schurmann) 在这里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研究成果，除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刊物外，还以《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学指南丛书》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形式出版专门性著作，其中包括从古代的《汉书》、《三国志》到明、清的《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指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指南》等。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是哈佛另一个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为主的东亚研究中心，系在纽约卡内基财团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下于1956年建立。由费正清和日本问题学者沃格尔 (Ezra F.

① 卡麦隆 (Meribeth E. Cameron)：《美国的远东研究》美国《远东季刊》，1949年2月号。

Vogel) 先后担任主任。主任之下还设有三个副主任，他们是：泊金斯 (Dwight H. Perkins)，主管中国研究；克雷格 (Abbott M. Craig)，主管日本研究；许华茨 (B. I. Schwartz)，主管研究方针和计划。参加研究的成员还有艾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巴兰脱 (Conrad Brandt) 和美籍中国学者刘广京等人。出版有《哈佛东亚研究》(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中国资料》(Papers on China)、《哈佛东亚丛刊》(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哈佛东亚专刊》(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等。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也是美国研究中国的重要中心之一。美国最早的中国学家卫三畏曾于1876年在这里建立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卫三畏死后，他的学生卫斐烈主持了耶鲁大学的中国学教研活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在卫斐烈的学生赖德烈主持下进一步扩大了耶鲁大学的中国学教研活动，1943年组织成立了中国语言学院，1945年扩建，改为东亚研究所。与此相适应，耶鲁大学图书馆专门设立了中文参考书图书馆。1959年赖德烈退休后，原斯坦福大学中国古代思想、儒家、道教和佛教的著名研究者芮沃寿 (Wright, Arthur Frederik)、胡佛研究所中国部的图书馆员玛丽·芮沃寿 (Mary C. Wright)、原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史籍翻译者弗兰克尔 (Frankel, Hans Herman) 和原密歇根大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者霍尔 (Hall, John W.) 相继来该校主持和进行了中国学教研活动。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是二次

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较为活跃的中心之一。它于二十世纪初建立了中文系和东方学图书馆，1929年又建立了日文系。先后由著名中国学家卡德 (T.F.Carter) 和傅路德 (L.C.Goodrich) 主持中国学教研活动。二次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进一步扩大了东方学教研活动。1946年开办东亚研究所，德·巴里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韦慕庭 (C.M.Wilbur)、巴尼特 (A.D.Barnett) 等主持领导了该校的中国学教研活动。作为其研究成果，较早的有卡德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to the West, 哥伦比亚出版社, 1931) 和韦慕庭的《中国前汉时期的奴隶制度》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943)。最近出版了韦慕庭所编的关于中共党史的文献集。

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十九世纪末创办了东方语言系，稍后创办了东方学图书馆。二次大战后，中国学教学和研究活动日渐扩大。1955年创办国际研究所，同年把原来东亚研究所合并入国际研究所，接着在国际研究所设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集中了大学里十一个部门的三十多个研究人员在这里从事亚洲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其中有布施 (Harris Busch)、艾伯哈德 (Wolfram Eberhard)、斯坦纳 (H.Arthur Steiner)、舒尔曼 (Franz H.Schurman)、宾板桥 (Woodbridge Bingham)、勒文森 (Joseph Levenson) 等人。二次大战后他们推行这样一项研究规划：中国史方面，研究

中世纪史（公元220—960年）的重要文献及其翻译和出版工作；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汉语的变化等。作为研究成果，五十年代在该校所办的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中国历史文献丛刊》以及《研究论文丛刊》等杂志、专刊上，发表了好多翻译和研究作品。如布兰特（Brandt, Conrad）所著《1924—1927年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1958年出版），艾伯哈德所著《中国史》（*A History of China*, 1950）和弗兰克尔所译《孟浩然传》（1952）和舒尔曼（F.H.Schurmann）翻译的元史食货志《元朝的经济结构，元史第93—94卷的译文》（1956）等。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二次大战后也发展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极为活跃的中心。二次大战后相继创办了远东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1946年建立）和远东和俄国研究所（1946年建立），接着1947年创办了东方学图书馆。近代中国历史、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研究者戴德华、迈克尔（Michael, Franz H.），中国古代史、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者威廉（Wilhelm, Hellmut），蒙古和蒙古语言的研究者波普（Poppe, Nicholas），研究西藏语言文化的美籍中国学者李方桂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的美籍中国学者肖公权等人，都集中在这里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二次大战后，他们在该校远东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和远东和俄国研究所制定推行了一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教学规